



流轉的記憶—— 從十七世紀的青花瓷筆盒談起

■ 余佩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兩件造型和裝飾紋樣非常相似的瓷盒，兩件作品並無紀年款識，可是透過器形和裝飾紋樣的比對，我們不僅可以追溯出可能的製造時間，還能發現一段與伊斯蘭金屬器筆盒相關的流轉脈絡。



左圖 1 17世紀 青花龍紋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圖 2 清 康熙 青花雲螭紋觀音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陳潤民主編，《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446，圖版289。



圖 3 清 順治 青花人物紋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陳潤民主編，《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頁33，圖版12。

樣式與傳世軌跡

首先，就裝飾紋樣來看，盒蓋螭龍躍起剎那，雙足外舉，張嘴嘶吼，甚至爲了維持平衡，頭與軀體因此扭成一個近似S形的姿態。其次，螭龍紋所在的水面，在龍身躍起之後，頓時波濤洶湧，風雲變色，龍足處凝聚小圈的旋渦紋，天空和水面上也滿佈由線描勾繪完成的流雲，除小局部畫成如意形外，多數爲揮灑出雲腳的折帶雲。（圖1）

據此檢視傳世器，發現與之相似的螭龍紋，也出現在〈青花雲螭紋觀音瓶〉（圖2），同時，用來烘托螭龍紋所在場域的折帶雲，約從順治朝（1644-1661）開始，已頻繁出現在〈青花人物紋盤〉一類作品（圖3），特別是雲紋逐層上疊，也橫向往兩側漫延的作法，因更常見於〈青花指日高升圖觀音瓶〉和〈青瓷水丞〉等康熙朝（1662-1722）系列作品（圖4），故可將之看成是從順治朝發展過來的變化。另外，以青線渲染、勾勒寬窄均一的線條，使之搭配潛藏其中的旋渦，營造驚濤駭浪景像，和另一類表現鯉

魚躍龍門故事的〈青花魚龍圖折沿洗〉亦相似。（圖5）此外，盒蓋周緣裝飾的回紋，以及器身沿邊由雙股雙線交纏而出的麻花紋樣，和上下交錯、點綴其間的變形如意雲朵，也能於〈青花螭龍紋缸〉找到相似的圖案。（圖6-1、6-2）該類紋樣曾爲學者看成是模仿自青銅器，故有



圖 4 清 康熙 青瓷水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 清 康熙 青花魚龍圖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1 清 康熙 青花蟠螭紋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陳潤民主編，《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頁 389，圖版 249。



圖 6-2 17 世紀 青花龍紋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蟠螭紋之稱。至此，用以對照、比較的作例，凡帶款識者，如〈青瓷水丞〉和〈青花魚龍圖折沿洗〉，皆為「大清康熙年製」款。（圖 7）而無款識作例，也為相關研究者視為康熙朝之下，讓我們可參照將兩件無款瓷盒看成是十七世紀康熙朝的產物。

另一方面，透過兩件作品的典藏號，也可以循線追索出 1924 至 1930 年代，當清宮紫禁城

轉變成為北平故宮博物院，清室善後委員會（以下簡稱善後委員會）前往盤點時，兩件文物的貯存位置。兩件瓷盒，一件登錄為「麗」字號，另一件則為「闕」字號。根據善後委員會的盤點紀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所示（以下簡稱《點查報告》），「麗」字意指清宮的古董房，而「闕」字則為壽安宮。所謂古董房，就《清宮瓷器檔案全集》提示的線索看來，大約可以理解成是一

個貯存文物的庫房。至於壽安宮，自乾隆十六年（1751）以後，經重新改建成為皇太后的住所。同時，《點查報告》載示，「麗」字號瓷盒其實是和其他六十五件文物，共同貯存於一個「木架」。而「闕」字號瓷盒，則和其他一百八十件文物，共置於一個「大木櫃」。此種情況，透過筆者過去處理過的養心殿「呂」字 1804 號和南庫「崑」字 226 號的組裝案例，得以反過來研判兩件瓷盒均是陳設組件中的文物。

另外，就文物的品名而言，來臺盤點之後的定名，如同《故宮瓷器錄》載錄，兩件作品均作〈青花龍紋長方墨盒〉。這個品名其實和善後委員會的稱謂完全不同，亦即《點查報告》中將「麗」字號瓷盒命名為〈青花長圓磁盒〉（《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頁 5-202），¹至於「闕」字號瓷盒，則被命名為〈青花白地長方盒〉（《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頁 9-366）。²由此可見，前後相差不到四十年的出版品，存在著相同物件，擁有不同的名稱；更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同一部著作對造型完全相同的兩件文物，卻標記著相

異的名稱。這些狀況，間接反映出文物傳世過程可能遭遇到的不同詮釋觀點，本文關注的瓷盒，不過是其中的兩個例證。

另一方面，無法給出統一定名的原因，也凸顯出不同階段的工作者，似乎未曾想過（或根本無法）從中建立一套標準的命名原則，所以讓文物的品名充斥著混亂的狀況。當我們回到《點查報告》，也發現「麗」字號「木架」下的六十六件文物中，還存在另外兩件瓷盒。由於那兩件瓷盒均帶「大明萬曆年製」款，故被命名為〈大明萬曆長方磁盒〉。若取之來與本文論述的「長圓」或「長方」瓷盒作比較，除可發現它們分屬兩類造型之外，即使單就兩件叫作〈大明萬曆長方磁盒〉的盒子而言，其形狀也與大家一般認定的矩形或長方形不同。也就是說，那兩件盒子和長邊銜接的短邊，均非直線，而是稜瓣形。或因如此，1960 年代故宮前輩編著《故宮瓷器錄》時，雖然保留《點查報告》登錄的「長方盒」之名，但於形制描述中，已將之調整為「四瓣長方形」（圖 8），從中區



圖 7 清 康熙 青花魚龍圖折沿洗 「大清康熙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明 萬曆（1573-1620）青花花果龍紋長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分和一般矩形或長方形的差異（《故宮瓷器錄》第二輯（乙），頁202）。照此脈絡，本文關注的兩件瓷盒，或因四個邊角均作圓弧狀，才讓《點查報告》的盤點委員，將之標記為〈青花長圓磁盒〉。不過，同樣令人訝異的是，何以又將「闕」字號瓷盒叫作〈青花白地長方盒〉？究竟只是盤點人員不同，所以從不同角度來定名，還是在沒有標準作業流程下的自由心證呢？

綜上所述，兩件形制完全相同的瓷盒，其實擁有三種不同的名稱，讓我們難以直接通過其中一款品名，來回溯《清宮陳設檔案》（以下簡稱《陳設檔》）和《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記事，進一步梳理相關的流傳軌跡和使用功能。以現行「觀箴」資料庫

為例，即使將「長圓瓷盒」列為關鍵詞，結果查無所獲。若改以「長方墨盒」，則在《內殿雜項浮記檔案》（1892）中，發現一件其實與瓷盒無關的「銅器長方墨盒（蓋裡代（帶）鏡子）」，因此嚴格而言，亦無助益。

意外的發現

相對於此，一旦換成「長方盒」，雖然資料增加許多，但和本文關注瓷質物件相關的訊息，仍然鮮見。也就是說，目前傳世的兩件瓷盒，其中「闕」字號文物帶木座，若以帶木座的特徵作為基準，其實可以追溯到嘉慶七年（1802）《養心殿西暖閣陳設檔》中，曾經存在一筆「青花白地磁長方盒一件，紫檀木座」，品目之



圖 9-1 清 乾隆 青瓷筆盒 Museum of Far Eastern Art (Foundation Baur) 藏



圖 9-2 清 乾隆 青瓷筆盒 「大清乾隆年製」款 Museum of Far Eastern Art (Foundation Baur) 藏

下，並且附註「道光元年七月十三日祿兒交，道光三年二月十九日庫收」，說明文物入藏的時間（1821-1823）。然而，就收貯地點來看，「闕」字號係屬壽安宮文物，是否可和收納於養心殿的物品畫上等號，猶待進一步考證。但是，同樣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若仍以帶「紫檀木座」的「青花白地長方盒」作為查詢的關鍵詞，又可從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壽意磁器」、嘉慶十年（1805）的地字號瓷器、嘉慶十一年（1806）的「賞人用」瓷器清單、咸豐十年（1860）的「壽意磁器賬」、光緒二年（1876）的「立庫收瓷器賬」和宣統二年（1910）的「立庫收瓷器賬」發現類似或相同的物件。

另外，近年出版的《紫禁城的記憶》一書，同樣也列出幾件造型與本文論述物件幾乎相同的瓷盒，而且該些物件的裝飾紋樣，至少涵蓋東青釉（圖 9）、黃地綠彩龍鳳和紅地黃彩纏枝花卉等不同類型，且帶有「大清乾隆年製」款的作例。同時，當該書作者卞亦文考慮為物件尋找可能的承造背景時，和筆者一樣，也想從清宮檔案著手；不過不同的是，卞亦文採用「長方水盛」作為關鍵詞。雖然筆者無從得知他從

何研判此類瓷盒可以看成是「長方水盛」，但從他摘錄出來的檔案記事（乾隆三年〔1738〕、宣統二年〔1910〕），的確讓我們無法從表露於文字紀錄中的「東青釉長方水盛」、「黃瓷綠鳳長方水盛」和「綠瓷黃龍長方水盛」，來排除品名與傳世物件的關聯。³

基於此，若參照卞亦文的關鍵詞，以「長方水盛」探索和本案相關的青花瓷盒。結果發現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檔案記事，存在一則將一件「青花白地長方水盛」納入「百什件」的紀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7，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匣棧作〉）特別由於本院收藏的兩件青花瓷盒，雖然分屬古董房和壽安宮兩個不同的貯存處所，但兩件文物均非單獨陳設，而是和其他物件共組一個「木架」和一個「大木櫃」。這類為善後委員會視之為「木架」和「大木櫃」的文物組合，若對照清宮《活計檔》紀錄，確實可將之看成是十八世紀名之為「百什件」的組合。所以，無論乾隆四十八年檔案記事登錄的「青花白地長方水盛」是否即為本文討論兩件瓷盒中的一件，該筆資料，至少是筆者目前爬梳出來最為接近善後委員會盤點文物時的收



圖 11 17 世紀 青花龍紋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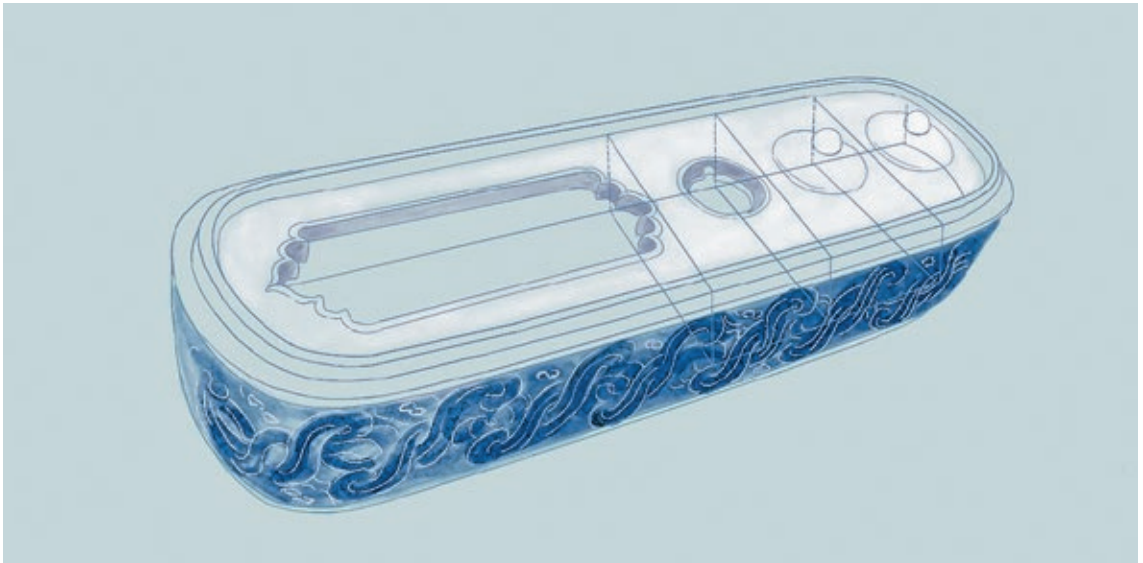


圖 12 17 世紀 青花龍紋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立體透視示意圖，馬成怡繪製。

納狀況。加上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乾隆五十年（1785）的兩本古玩清冊中，也各登錄一筆帶木座的「青花白地長方水盛」，從兩筆紀錄似能回應「闕」字號瓷盒帶木座的狀態（圖 10），可將之列為未來持續探索的重要線索。

和伊斯蘭金屬器筆盒的關聯

但是，面對實物，不免令人好奇，瓷盒的用途以及形制來源。以古董房的「麗」字號瓷盒為例，當蓋子掀起來後，首入眼簾的是和器身相黏、無法移動的面板，及另一半一眼到底的凹

槽。(圖 11) 爲了遷就瓷盒左右兩側的圓弧狀短邊，如圖所示(圖 12)，器內兩側邊稜亦順成弧線。至於附器蓋的另一半內裝隔間，雖然無法一眼望穿，但透過實物觀察，得以理解是三個等大的小凹槽。同時，爲了防止器蓋脫落，面板上的承蓋圓孔，均再仔細切割出類似鑰匙孔的開闔點，讓蓋上後的器蓋，能夠透過避開出孔的作法來固定。以此結構來看另一件「關」字號瓷盒，也能從中對照、復原出「關」字號瓷盒，最初應該也擁有三個器蓋。(圖 13)

再就使用功能而言，如果參考前人已經指出，此類瓷盒可以當作「墨盒」或「水盛」等文

具來理解，那麼，明朝永樂時期(1403-1424)生產的青花瓷筆盒，或能提供我們探索十七世紀瓷盒來源脈絡的參考。以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的永樂青花瓷筆盒爲例(圖 14)，除去器蓋內裡、面板和開放式凹槽內底均較十七世紀瓷盒多出一些裝飾紋樣之外，再就整體形制的設計，不難發現兩者存在的關聯。⁴ 關於此，回溯十五世紀上半葉的生產脈絡，除了傳世品之外，1993年考古人員也在中國江西省景德鎮珠山東院遺址發現帶「大明宣德年製」款(1426-1435)的標本(圖 15)，⁵ 同時，考量到十五世紀上半葉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無論出



圖 10 17 世紀 青花龍紋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17 世紀 青花龍紋筆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圖 14 明 永樂 青花瓷筆盒 (Writing-box) 中國江西省景德鎮 原大維德基金會 (Sir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藏，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PDF A.629 取自該館網站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PDF-A-629 (CC-BY-NC-SA 4.0)，檢索日期：2022年7月4日。

右圖 15 明 宣德 青花歲寒三友紋筆盒殘件 中國江西省景德鎮珠山東院遺址出土 取自鴻禧美術館主編，《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8，頁 121，圖版 13。

於政治考量或商貿需求，曾經經由海路或透過陸路密切往來。而且美國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也收藏一件具有 1210 年紀年標誌（圖 16），推測可能製造於哈烈（赫拉特，Herat）的金屬器筆盒，讓我們得以從哈烈即為十五世紀帖木兒帝國（Timurid dynasty）的首府，連結到該時該帝國與中國明朝的交往，進而探詢可能的仿製軌跡與傳輸管道。

其次，若從帶給永樂瓷筆盒啟發的伊斯蘭金屬器筆盒著手，就筆者目前收集到的資料來看，該類金屬器筆盒主要流通於十三至十四世紀，但亦有晚至十四到十五世紀的例證。根據學者研究，伊斯蘭世界信仰《古蘭經》（*Quran*），該經典被視為是上帝創造的無可取代的文本。因此之故，抄錄經典，從中獲取教育與智慧極為重要。為了達成目的，伊斯蘭世界以蘆葦管來製筆（實際包含蘆葦、竹稈和木頭等材質），稱作蓋蘭筆（*Qalam*）。由於筆管本身已經經過乾燥和切削處理，需要沾墨水才能書寫。所以從十二世紀開始，伊斯蘭世界已經製造出如玻璃、青銅和黃銅等各式墨水瓶，後來為了收納書寫必備的墨水、筆和清潔用品，至十二世紀中葉左右，逐漸出現筆盒。而且造型多樣，具有平行四邊形、楔形、矩形和長圓形等不同的變化。⁶ 今天通過波斯細密畫，也可以了解十六世紀時人們使用筆盒的情景。⁷（圖 17）事實上，《古蘭經》經義中禁止偶像崇拜，利用文字來溝通，反而成為傳達教義的一項重要形式。有趣的是，儘管經義已明文勸阻人們使用貴重金屬器和裝飾有形物象，然而，今天保存在歐美若干大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和佛利爾美術館等）的筆盒，卻不乏裝飾考究的貴重金屬器，其款識亦涵蓋製作年代，或美好

祝福的詞彙。⁸

回到本文關注的康熙朝瓷盒，首先，經由和前述永樂朝作品的比較，至少可以將該類瓷盒看成是來自永樂朝瓷筆盒的重新仿製。由於永樂朝產品的原型，其實來自於伊斯蘭金屬器，基於此，兩件康熙朝瓷盒亦可理解成是與伊斯蘭金屬器筆盒相關的筆盒。儘管如此，伊斯蘭金屬器筆盒的各種樣式中，最常出現的是矩形和長圓形兩種，而且從傳世器看來，兩者年代互為重疊，無法視為具有先後的演進關係。因此，不免令人想繼續追究，何以仿製之初，明



圖 16 1210 金屬器筆盒 (Pen Box)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取自 Esin Atıl, W.T. Chase, and Paul Jett, eds. *Islamic Metalwork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5, 102, plate 14.



圖 17 1638~1639 波斯細密畫—筆盒 A STUDIOUS LADY 局部 SIGNED MUHAMMAD MUQIM, SAFAVID IRAN, DATED AH 1048/1638-39 AD 取自《Christie's 佳士得》：<https://reurl.cc/p69dZb>，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6 日。



圖 18-1 14 世紀前期 黃銅器折沿盆 (Bassin dit "Baptistère de Saint Louis") 法國羅浮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collections.louvre.fr/en/ark:/53355/cl010318774>，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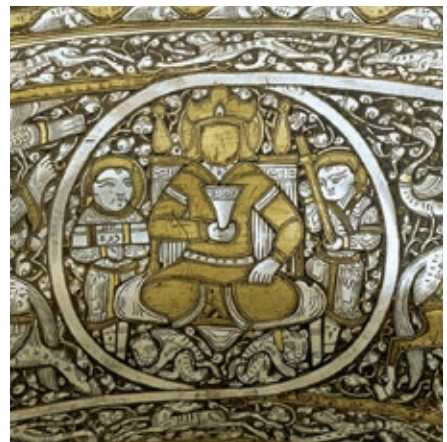


圖 18-2 14 世紀前期 黃銅器折沿盆 (Bassin dit "Baptistère de Saint Louis") 局部 法國羅浮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collections.louvre.fr/en/ark:/53355/cl010318774>，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5 日。

朝陶工選擇了長圓形，而非矩形的形制？對此，若思考 Eva Baer 曾經提到的區域品味分流的問題，或可做為現階段研究的一個參考。

Eva Baer 在 *Metalwork in Medieval Islamic Art* 一書中，特別以法國巴黎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 收藏，鑄造於十三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

前期的黃銅器折沿盆為例，指出該件器作的裝飾紋樣中即存在一件金屬器矩形筆盒。(圖 18-1、18-2) 如圖所示，一幅表現埃有比王朝 (Ayyubid dynasty) 和馬穆魯克 (Mamluk) 時代的文書紋章圖像中，居中端坐一位高級官員，兩旁分別陪侍兩位大臣；其中武臣持劍，文臣手捧筆盒，

充分傳達出馬穆魯克時代的朝臣官制。⁹ 因此讓 Eva Baer 推論隨著時間的演進，矩形筆盒日漸受到馬穆魯克王朝的青睞。相對於此，具有圓融調性的長圓形筆盒，則比較受到伊朗地區人們的喜愛。如果 Eva Baer 的觀察有其依據的話，那麼，這條線索倒是可以呼應 John Alexander Pope 以為十五世紀中國與伊朗往來的事蹟，¹⁰ 聊備一格地為景德鎮陶工仿製長圓形筆盒，增添一個可能的想像空間。

跨代／跨域的記憶

儘管如此，我們必須面對康熙朝瓷筆盒的製作時間，其實和十五世紀上半葉的永樂朝至少存在三百年以上的差距。為此，除了需要先釐清何以到了十七世紀下半葉，仍然生產伊斯蘭風格樣式的瓷筆盒，同時也有義務梳理永樂至康熙朝兩個端點中有無相關的承製關聯。關於此，也許不完全能夠看成是一艘沈船，在菲律賓巴拉望西海岸（目前網路標注為北邊）發現的 Lena Shoal Junk，從另一個面向，提供一些值得思索的材料。首先，Lena Shoal Junk 所在的航道，過去鮮為人所知。當這處遺跡出土後，曾有考古學者試著對照《順風相送》一書載錄的近百條航道，從中尋找足以對應的路線。但因無法確認，所以激發歐洲水下考古研究所（Institut Européen d'archéologie Sous-Marine）重新為該處海域進行探勘。根據報導，他們最終發現幾艘十一至十六世紀的沈船遺骸，並且據以回頭修正巴拉望西海岸曾有船隻通行的可能性。但是真相究竟為何？似乎還需要累積更多的材料才能定論。¹¹

事實上，Lena Shoal Junk 沈船遺跡總共出土了三件青花瓷筆盒，其中兩件還是完整無缺的整器。¹²（圖 19）不僅如此，Lena Shoal Junk 出土的多數中國瓷器，具有十五世紀末至十六



圖 19 青花瓷筆盒（Pen box） Lena Shoal Junk 沈船出水 取自 Goddio Franch and Gabriel Casal, eds. *Lost at Sea: 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 116, plate 33.

世紀初期的風格特徵，除了可以取用其中的瓷筆盒和其他作例，為土耳其托布卡匹皇宮博物館（Topkapi Palace Museum）的藏品定年之外，Lena Shoal Junk 同時涵蓋來自中國、越南、泰國和緬甸馬都八（Martaban）陶罐、馬來半島的火器、銅器，以及一些尚待辨識產地的物件組合，在在提示十六世紀初期中國和東南亞海域的貿易往來。甚至通過典型的伊斯蘭風格的瓷筆盒，暗示航程最終站也有可能是伊斯蘭世界的中東市場。從航線開發的面向，另外回應了十六世紀逐漸展開的全球之旅。

特別是幾乎和 Lena Shoal Junk 出土筆盒完全雷同的托布卡匹皇宮博物館藏品，器表裝鑲著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風格的鎖鏈和纏枝花葉紋寶石，展現出鄂圖曼帝國獨有的鑲嵌工藝，讓學者一度將之看成是蘇萊曼一世（Sultan Suleyman I, 1520-1566 在位）的用器。¹³ 無獨有偶，Lena Shoal Junk 出土的瓷器中亦涵蓋二十八件左右的越南陶瓷，其中一件具有圓盤口長頸和漏斗狀長流特徵的青花瓷軍持，在土耳其托布卡匹皇宮博物館也看得到。¹⁴ 再者，

日本私人收藏中，也存在一件越南青花瓷筆盒（圖 20），該件作品的造型與紋飾，亦與 Lena Shoal Junk 瓷筆盒存在若干相似處，展現出令人想像不到的跨地域生產同質性物件的現象（難道同樣都為中東市場而生產？）。¹⁵ 甚至透過 John Carswell 提示，敘利亞一地曾出土具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樣式的青花執壺和筆盒，以及經由日本學界實地考察後發現埃及福斯塔特遺址（Fustat），同時也匯聚了來自越南、泰國、緬甸等地的十五、十六世紀陶瓷器。這些看似能夠呼應 Lena Shoal Junk 出土物件的組合，¹⁶



圖 20 15～16 世紀 越南青花瓷筆盒 (Brush holder with animal and floral designs in oval panels painted in underglaze cobalt and deteriorated overglaze enamels.) 日本私人藏 取自 John Stevenson, John Guy and Louise Allison Cort, eds.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Ltd, 1997, 342, plate 302.



圖 21 1510 土耳其伊茲尼克 (Iznik) 青花瓷筆盒 (Blue and white glazed pen-box)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reurl.cc/KXMq8G> (CC-BY-NC-SA 4.0)，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2 日。

又從另一個面向反映出十六世紀流通於東南亞海域的商品，除了供應亞洲內部需求之外，從馬來半島南部的麻六甲（Malacca）經印度果阿（Goa），再到霍爾木茲（Hormuz）鄰近海域的貿易航道，或許也是此類筆盒運輸的一個管道？

相對於此，十六世紀土耳其的伊茲尼克陶器系列作品（Iznik）中，也存在以鈷料裝飾，看起來頗具中國青花瓷風格，但形制為矩形的瓷筆盒。以大英博物館一件定年為 1510 年的作品為例（圖 21），該件筆盒器表裝飾《古蘭經》經句，同樣在後加的銀飾件上，也標記有塞利姆三世（Selim III, 1761-1808, 1789-1807 在位）的花押（Tugra）。¹⁷ 這些裝潢可和托布卡匹皇宮博物館收藏的中國製青花瓷筆盒對照，反映出模仿伊斯蘭金屬器的瓷筆盒，持續流通且深受皇室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學界對於伊茲尼克陶瓷的生產與出現，雖然持有或深受托布卡匹皇宮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陶瓷啟發之觀點，但同時也指出伊茲尼克陶工實非照單仿燒中國樣式，亦有其獨創性。在此論點下，讓筆者聯想到，土耳其陶工採用矩形作為瓷筆盒的形制，是否也是因為接觸管道不同，所反映出來的品味分流現象？

清宮收納脈絡

最後，我們仍然需要面對的是，如果十七世紀青花瓷筆盒的製作背景猶和伊斯蘭世界有所關聯，那麼推動這波生產的契機又是甚麼呢？從目前起步研究階段的材料看來，清初皇帝看待回民的態度或是需要考慮的面向。我們從雍正七年（1729）《清實錄》記載：「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人，籍貫不同，……，是以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亦從俗從宜，各安



圖 22-1 17～18 世紀 玉墨瓶筆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2 清 銀筆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習。……」的內容，¹⁸除了見識到雍正皇帝（1723-1735 在位）釋出的友善態度之外，這股氛圍彷彿能夠回應康熙皇帝《幾暇格物編》中有關「哈密引雪山水灌田」等幾則和「哈密」、「吐魯番」風土民情相關的記載；一窺中國與西亞通過陸路往來，進而為具有伊斯蘭風格的瓷

筆盒，鋪陳出另一個可能的接觸管道。

其次，從作品研究的角度來看，另外兩筆材料或可作為日後持續探究的參考。其一為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皇帝〈詠痕都斯坦玉墨瓶筆室有序〉，在「削木中書擬管城」一句之下，特別用註說明「中土聚豪為筆，外域



圖 23 印度 玉葉形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1 明 正德 (1491-1521) 白瓷描紅阿拉伯文波斯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2 明 正德 白瓷描紅阿拉伯文波斯文盤 局部 作品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削木供書，猶存古製也」（《清高宗御製詩集》三集，卷 72），¹⁹ 皇帝透過御製詩文明白指出削木為筆的概念，不僅可以和清宮收納的木筆對照（圖 22-1、22-2），亦能鏈結伊斯蘭世界使用蘆葦筆書寫的習俗，說明十八世紀乾隆時代對伊斯蘭世界文具的理解。

其二，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檔案記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1，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燈裁作〉）載錄當時清宮盤整文物，更換包裝、分類收納之際，曾有用「回子布」來包裝「回子器」的想法。從配裝過程所羅列出來的物件清單，可見其中存在一件名為〈青玉桃式盒〉的文物，該件玉盒最後獲配「紅絨裡回子布面錦套」。²⁰ 這則記事讓筆者從其形制聯想到院藏一件定名為〈葉形盒〉的印度玉器。尤其該件玉盒也隨附收納布包，布包內裡同樣展現出可看成是「紅絨裡」特色的內裡。（圖 23）在這個層次的觀察上，進一步連連看的話，也可以透過另一件〈明正德描紅回文盤〉來思考其間的關聯。由於回文盤同樣也附有和玉盒一樣的布套（圖 24-1），呈現清宮收納規劃給予類似風格文物一致性的包裝，從中可將回文盤的布包和隨盤收納的翻譯文書看成是乾隆朝配組完成的附件。其次，翻譯文書特別將明朝製造的回文盤，改標成「大清年蘇賚曼所書經文」的作法（圖 24-2），若考慮到瓷盤內外的其他文句均能如實翻譯下，「大清年」的出現，無論可否將之看成是清宮窯預擬仿製的款識，至少表現出乾隆年代，具有開放性看待回教經義及與之相關的交流事蹟。是以，乾隆四十八年才會將一件隱含伊斯蘭風格樣式的瓷筆盒納入「百什件」，同時也生產其他不同釉彩的瓷筆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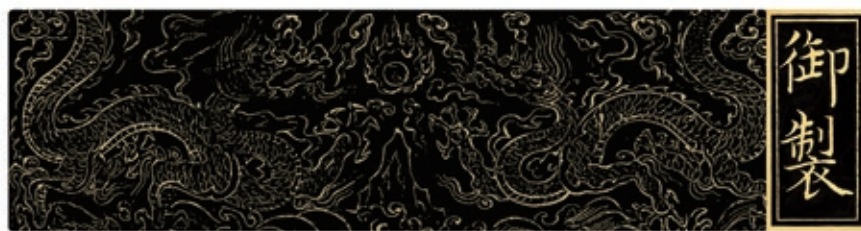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註釋：

1. 清宮檔案登錄瓷器物件，品名表述上，有時將之標記為「磁」，有時則為「瓷」。為忠於原著，均照列登錄品名。
2. 檢視《壽安宮庫木器挂屏等項檔》（宣統二年，八月），雖可見相關櫃架陳設，但因無細項品名，故無從確認何者為本文關注的「大木櫃」。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冊 37，頁 747-775。
3. 卞亦文，《紫禁城的記憶：圖說清宮瓷器檔案·文房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頁 123。不過，筆者其實是得到 Museum of Far Eastern Art (Foundation Baur) 沈以琳女士的協助，方確認東青釉長方水盛底部的款識。特此申謝。
4. 圖版及說明，參見 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eds.,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95.
5. 出土標本，見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主編，《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8），頁 292-293。新近公布的例證，見郭學雷主編，《大明宮瓷：十五世紀的明代宮廷用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頁 74-75。宣德款瓷筆盒例證，可參見日本山形縣掬粹工藝館藏品。
6. 學界亦有伊斯蘭長圓形金屬器筆盒，其實仿自木製品的說法。見 Eva Baer, *Metalwork in Medieval Islamic Art*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62-72.
7. 圖版取自〈A STUDIOUS LADY〉，《Christie's 佳士得》<https://www.christies.com/lot/a-studious-lady-signed-muhammad-muqim-safavid-5885504/?intObjectID=5885504&lid=4>（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6 日）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廖翊均女士提示。
8. Schimmel, Annemari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Barbara Rivolta, "Islamic Calligraph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50, no. 1 (1992): 1-56.
9. Eva Baer, *Metalwork in Medieval Islamic Art*, 7. 事實上，黃銅器折沿盆出現矩形筆盒的圖畫共兩幅，見 D. S. Rice, "The Blazons of the 'Baptistère de Saint Lou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3, no.2 (1950): 367-380.
10.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19-25. 大明帝國和帖木兒帝國往來，見張文德，《明與帖木兒王朝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或（波斯）火者·蓋耶速丁著、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324-366。
11. Franck Goddio, "The Wreck on the Lena Shoal," in *Lost at Sea: 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 eds. Franck Goddio and Gabriel Casal (London: Periplus, 2002), 4-8.
12. Monique Crick, "Typology: Porcelain and Ceramics," in *Lost at Sea: 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 116.
13. 學者研究以為 Topkapi Palace Museum 收藏的金屬鑲嵌陶瓷，其加嵌技藝始見於十六世紀上半葉，至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方較流行。見 Julian Raby and Ünsal Yücel, "Chineses Porcelain at the Ottoman Court," i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eds. Regina Krahl et al.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1: 48-49. 金屬飾件的討論見 Regina Krahl, "Porcelain with Ottoman Jewelled Decoration," i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eds. Regina Krahl et al.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2: 833. John Carswell 的觀點見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8), 131 and 134.
14. Rosemary E. Scott, "Connoisseurship and Commerce," in *Lost at Sea: 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 190-195. 土耳其托布卡匹皇宮博物館的物件，見 Regina Krahl, "Porcelain of th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Including Vietnamese Wares)," i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527-528.
15. John Guy, "Vietnamese Ceramic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 eds. John Stevenson, John Guy and Louise Allison Cort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Ltd, 1997), 47-61 and 342.
16. 見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131. 福斯塔特十六世紀出土物件，見（日）弓場紀知，〈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1998-2001 年研究成果介紹〉，《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 1 期，頁 129。
17. John Carswell, *Iznik Potter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6), 37-38.
18. 孔德維、黃庭彰、李依紡編，《回民：《清實錄》所載 1800 年前大清帝國與伊斯蘭教史料彙編》（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頁 61-62。
19. 書寫用筆及說明，見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96。
20. 筆者從《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獲致相關訊息，查詢原檔之後，又以為「青玉桃式盒一件」當是與本院典藏故玉 1378 類似的物件。鄧淑蘋論點，見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15、160。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珍藏

SPLENDORS OF
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明清宮廷藏書特展

RARE BOOK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IMPERIAL LIBRARIES

2023.03.11 — 07.16

主辦單位
ORGANIZERS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協辦單位
SUPPORTER



111001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o.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001, Taiwan (R.O.C.)
Tel: (02) 2881-2021 | <https://theme.npm.edu.tw/exh112/BAVrarebooks/>

